

商
界
旧
踪
S
H
A
N
G
J
I
E
J
I
U
Z
O
N
G

商界旧踪

朱英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旧
踪
J
Z

商界 国际

朱英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界旧踪/朱英著.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1.1

(旧踪丛书:6)

ISBN 7-5392-3449-0

I.商... II.朱... III.商业史-史料-中国
IV.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7368 号

商界旧踪

朱 英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省南昌市老贡院 8 号 330003)

URL:<http://www.jxeph.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江西省南昌市洪城路 636 号 330009)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80 毫米×1230 毫米 24 开本 9 印张

195 千字 印数:1-2600 册

ISBN 7-5392-3449-0/G·3290 定价:15.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BAI-P. 19/5

古今中外,举凡论及商人,似乎都离不开辄铢必较、唯利是图等充满贬抑意味的字眼。特别是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业被“贬之曰末务”,商人也曾被“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不得与士大夫伍”。这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推行“重本抑末”政策的传统偏见。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贱商轻商的习俗在中国长期沿袭难改。“士农工商”的四民定位,也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一成不变的凝固模式,商人始终处于极为卑贱的地位抬不起头来。提起商界,在一般人眼中似乎也只是充满倾轧欺诈、无信无义的污浊世界。这些片面的看法,直至近代晚清时期,随着各方面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和重商思潮的兴起,才逐渐有所改变。事实上,无论是商人的思想与行为,还是整个商界的实际情况,都绝非一般人主观所想象的那样。本书即希望通过叙述若干实例,从不同的方面向读者粗略地展现近代中国商人与商业发展的真实概貌。

近代中国的新兴商人,应该说是一个顺应历史发展并且颇具活力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中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与古代商人所不同的是,近代的所谓商人,并非是单指买卖人的狭义商人概念,而主要是指一种广义商人的称谓。在近代,除了将从事商业和金融业的人称为贸易商、钱商、金融商、证券商之外,还将从事生产制造和交通运输的人也称为制造商、生产商、运输商等。换言之,凡从事实业活动的人几乎在近代都被

称为商人。不仅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习俗如此,而且在法律上也有这种广义的商人界定。例如北京政府 1914 年 3 月颁布的《商人通例》,就将商人的范围界定为:从事买卖、赁贷、制造、加工、水电煤气、出版印刷、金融、信托、劳务承揽、旅店、堆栈、保险、运输、托运、牙行以及居间代理等业之人。因此,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本书所介绍的商人,也是广义概念的商人,而不是单指狭义的买卖人;所谓商界,实际上也是指整个实业界。即使是在今天,这种广义的商人概念也仍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沿用,所谓“下海经商”就不仅仅是指从事商业买卖,而是指从事实业活动。

除了广义和狭义之分,近代的商人与古代的商人相比较,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从本书介绍的内容可知,近代商人的思想意识已明显出现由旧趋新的很大变化。晚清时期的商人就已萌发了过去所没有的合群思想与时代使命感,同时还初步产生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爱国思想,其信义观和诚信观较诸古代商人也出现了新的发展演变。在组织发展方面,近代商人成立了商会、商团以及商办地方自治组织等各种新型社会团体,其结构、功能与作用都与传统的商人组织有着明显的差别。近代商人所开展的活动也更为丰富多样化,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的政治运动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包括民族主义运动、立宪请愿运动以及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商人都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支社会力量。此外,近代商人还曾开展地方自治活动、“国民自决”运动,并多次出面调和政争,所产生的影响虽然不尽相同,但却表明近代商人在政治上已日趋活跃。在经营管理方式上,近代的商人尽管仍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落后残余,但也具备了体现新时代特征的开拓勇气与竞争精神,不断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经营管理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推陈出新,而且敢于与实力强大的外国资本一争高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本书介绍的许多近代著名商人及其企业,在这方面都留下了值得赞叹的业迹和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读史可以益智。本书的作者真诚希望通过对近代商人与商界有关情况的简略介绍与分析,使当今的读者,特别是实业界的朋友们能够温故而知新,从中汲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

目 录

前 言	(1)	百年张裕,品重醴泉	(54)
郑观应及其“商战论”	(1)	“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	(58)
晚清著名“状元资本家”张謇	(5)	“Customers are always right”	(62)
以经商和创办慈善事业著称		“始创不二价,统办环球货”	(66)
的经元善	(9)	推行“科学管理”的穆藕初	(70)
一叶扁舟起家的富商叶澄衷	(13)	吴蕴初与“天”字号企业	(75)
“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		范旭东与中国近代化学工业	(79)
一封信”	(17)	武汉劝业奖进会的举办	(83)
“赤脚财神”虞洽卿	(22)	南洋劝业会的空前盛况	(87)
地方自治的商界先驱李平书	(27)	广告为国货开道	(91)
“煤炭大王”与“火柴大王”		打破垄断,扬我品牌	(97)
刘鸿生	(31)	抵制洋货,提倡国货	(102)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简氏		管理方式的落后残余	(106)
兄弟	(36)	“橡皮股票风潮”震惊全国	(109)
“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的		“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	(113)
荣氏兄弟	(40)	“宁人负我,无我负人”	(117)
北洋工商巨子周学熙	(45)		
卢作孚的良谟宏愿	(50)		

见利不忘义,言商仍向儒	(122)	商人自行拟订商法的尝试	(168)
商会的诞生发展及其影响	(127)	上海商人与拒俄、拒法运动	(173)
商团的设立及其意义	(132)	曾对美货说“不”	(177)
上海商办地方自治机构的 创立	(136)	商界怒吼“路权即国权”	(182)
苏州商人的市民公社	(140)	商界高呼立宪改革	(187)
行会在近代的演变	(144)	商会、商团支持辛亥革命	(191)
商会的独立自治	(149)	民初商会调和党争	(196)
商会的民主特征	(153)	商人与“二次革命”	(201)
商办报刊的出现	(158)	民初商会调停政争	(204)
商办报刊的发展	(163)	从“在商言商”到“在商行政”	(207)

郑观应及其“商战”论

郑 观 应 及 其 “ 商 战 ” 论



郑
观
应

熟悉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人们都知道,“商战”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颇具影响的一个特有范畴,也是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商界志士所常用的一个理论武器,它的实质内容是要求发展中国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商战”论不仅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

进行经济侵略的危害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有更全面的理解。它曾在近代中国广泛流传,早期的一些维新思想家大都就此作过论述。然而,最早提出“商战”口号,论述最全面、最深刻,其影响也最为突出者却是上海的广东籍商人郑观应。

郑观应又名郑官应,字正翔,号陶斋,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1858年17岁时放弃科举道路,来到上海学习经商。在此后的20年左右,他先是相继在英商宝顺洋行和太古轮船公司担任职位较高的买办,后自己投资创办经营进出口业务贸易公司,又在一些重要口岸参与投资创设轮船公司。并曾应清朝洋务派官僚聘请,先后出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与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一些重要企业的关键职务,另还曾担任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的总经理,由此在近代上海商界被誉为“大商”。郑观应虽然也属商人,但与一般商人所不同的是,其作为“儒商”的色彩较为浓厚。他不仅“幼猎书史,长业贸迁”,而且在上海的几十年经商生涯中,非常注重“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广泛阅读了西方国家的有关书籍,以西方诸国对照中国的现实情况,同时受到早期维新思想影响,逐渐萌发了一系列变革观念。他曾著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书,并编有诗集。在许多文章中郑观应都曾对“商战”进行过论述,尤其是《盛世危言》辟有“商务”以及“商战”专篇,成为当时流行较广、影响较大的书籍之一,甚至还流传到日本和朝鲜等国。

郑观应的“商战”论,首先阐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包括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这两种主要方式,其中尤以经济侵略更为危险,故而更应引起国人重视。因为“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其意思是说用武力吞并他国,对该国的祸害很容易为其觉察,而以通商之法对他国进行搜刮掠夺,则可灭国于无形之中。他在《盛世危言》一书中还指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军事侵略,目的就在于为经济侵略开辟道路:“各国兼并,各国利己,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

其次,郑观应的“商战”论强调指出,针对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中国也应采取两种方式进行抵抗,即用“兵战”抵御外来军事侵略,用“商战”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而且要将“商战”放在首位。他将兵战称为“有形

論云能富而後能強能強而後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國強非強不能保富富與強實相輔賴也然富出於商商出於士農工三者之力所以泰西各國以商富國以兵衛商不獨以兵爲戰且以商爲戰況兵戰之時短其禍顯而戰之時長其禍大善於謀國者無不留心各國商務使士農工商投入所好益我利源惟中國不重商務而士農工商又各自爲謀雖屬爲外人所欺而不知富強之術則則兼欲極征不思慮工商以興大利練兵則船炮皆廢不知廣學業以啟聰明所謂祗知形戰而不知心戰者也形戰者何以爲彼有槍礮我亦有槍礮彼有兵艦我亦有兵艦是亦足相抵銷矣孰知舍其本而圖其末遺其精義而襲其皮毛心戰者何西人豈意通商試登己以損人與商立法則心精而力果於是十有倍致之學工有製造之學員有種植之學商有商務之學無事不學無人不學我國欲安內攘外亟宜練兵將製船礮備有形之戰以治其標講求泰西士農工商之學務無形之戰以固其本如廣設學堂各專一藝精益求精仿宋之司馬光求數十科考士之法以示鼓勵自能人才輩出日趨富強矣蓋利器爲形利用爲心有利器而不能利用則人如木偶安得不以制人者而制於人故有治法必須有治人西人以商爲戰士農工爲商助也公使爲商通也領事爲商立也兵船爲商置也國家不惜鉅貲增加保護商務

之戰”，把商战称为“无形之战”，认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因为有形的“兵战”只能治标，而无形的“商战”却能治本。商具有“握四民之纲领”的重要地位，“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所以中国必须“以商立国”。这显然是对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以及社会上盛行贱商陋俗的有力批判，在当时无异于发聋振聩的呐喊。

再次，郑观应的“商战”论还指明了中国应该如何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他所说的“商”，并非单纯指商业，而是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等各个部门。他虽然更强调商业的重要，但也不否认工业和其他部门的作用，因此进行“商战”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的商业和整个民族资本主义，否则所谓“商战”就只能是纸上谈兵。另外，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确实比中国发达得多，中国商人应该从中学习“商战”的知识与经验。按照郑观应的说法，那就是“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这种看法与主张，在当时不失为一种理性的认识。

郑观应“商战”论的提出，表明近代中国商人在新历史条件下，已对自身

的社会地位以及商业的重要作用,获得了以往所没有的新认识。他之所以能较早获得这种新认识,并对整个商人产生较大的影响,显然是因为他一直处在“商战”的第一线,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为明显,对西方列强利用“商战”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的为害之烈也有更加切身的感受。“商战”论提出之后,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上海商界以至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仅商界中人竟言“天演”公理,纷陈“商战”要略,亟谋振作改良之策,各界人士也呼吁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以救亡图存。汇录于上海《选报》上一篇题为《论自由权与商战之关系》的文章,即表达了世纪交替之际包括商人在内上海各界人士的这种迫切心情。这篇文章指出:“二十世纪之世界,一全球相争相竞之世界也。竞争之目的,在求所以自存而达目的之方法”;“商战之胜负,其利害得失之关系,于为国者,尤较兵战为甚,盖兵战而不胜,犹可养精蓄锐,徐图恢复;……若商战而败,则国民之脂膏已竭,经数十年而元气未苏。外人所握我养命之权,即有以制我之死命,虽有志士,无能为力”。“是故无形之战争,其祸常烈于有形,而优胜劣败,固竞争场之公例也。”(引自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0页。)由此可见,郑观应的“商战”论提出之后很快即为广大商人所接受,实已成为近代中国商业文化中一个新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新思想之一。

晚清著名“状元资本家”张謇

晚清著名“状元资本家”张謇



张謇

在中国历史上,经科举入仕是无数文人士子朝思暮想并为之奋斗一生的追求目标,而状元及第,更是科举士人最高的荣誉,它意味着打开了通向宦海生涯之门,可以获得令人炫目的功名利禄。但在晚清,却有一位在科举路途上累遭挫折,年逾不惑才幸而取中状元者,并未由此跻身宦海,而是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荆棘丛生的创办实业之路,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他就是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张謇。

张謇,字季直,50岁以后以啬庵为号,有时也称张季子,晚年则自号啬翁。1853年7月1日,张謇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一个富裕

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兄弟5人中,他排行第四。幼读私塾,父亲见其聪

颖,一心希望他走科举入仕之路。1868年,15岁的张謇开始进入科举试场。尽管科试、岁试成绩优异,乡试却一直未能获捷,连举人的名号也迟迟难以求得。1885年张謇已是32岁,赴京参加顺天乡试终于以第二名录取,时称“南元”,即南方士人参加顺天乡试的魁首。然而,这之后张謇的科举路途仍非一帆风顺。从33岁至39岁,他接连四次参加礼部会试,结果都是名落孙山。到1894年张謇已是41岁,迫于父命再往应试,这次却在礼部会试中取为第六十名贡士,复试又取为一等第十名,获得参加殿试的资格。最后,出乎意料地在殿试中被取为一甲第一名赐进士及第(状元)。经过26个春秋的坎坷曲折,张謇总算是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张謇考中状元后,被授以翰林院修撰,取得了清朝官员的身分,但他并未借此在官场中寻求步步高升,而是投身于创办实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状元办厂堪称令人惊异之举,但对张謇而言却决非偶然。数十年在科举试场中的多次受挫,使张謇耗费了不知多少心血,同时也使其对追求功名利禄趋于淡泊。最后一次应试纯粹是出于孝道,其父随后病逝,更使他感到“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由是之故,张謇对做官看得愈益轻淡。与此同时,张謇的经世致用与爱国救亡思想日趋强烈。甲午一役中国惨败于蕞尔岛国日本,深深刺激了张謇的爱国之心,仁人志士纷纷呼吁“设厂自救”,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以抵御西方列强的扩张渗透。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此时也逐渐形成,促使他毅然走上了创办产业的道路。

在当时,张謇以状元和翰林身分而走上兴办实业之路,可谓一种情操上的牺牲。从一向居于“四民之首”而且以清高自命的封建士大夫群体中的一员,忽然转而与长期被视为“四民之末”的商人为伍,这在一般士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他本人也未尝没有经过一番思想交锋。但张謇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以爱国者的姿态兴办实业,并非出于个人利害的考虑,应该能够得到世人的理解。事实证明,后人对他的这一选择不仅能够理解,而且深为敬佩。此外张謇投身实业后,坚持“言商仍向儒”,始终以儒商的身分出现。他强调自己兴办实业是为了筹措经费发展近代教育,即由士林出发,经过商贾又回归士林,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他在道义上寻求的依据。

幸运的是,由于张謇经营有方,并依靠其状元身分与封建势力斡旋,他最早创办的大生纱厂开工后利润比较可观。这使张謇兴办实业的信心大增,1901年他又开始筹办通海垦牧公司,希望将濒于荒芜的海滩改造成近代棉纺织业的原料基地。虽然“开办之始,无地可栖”,但经过整整10年的艰苦创业,终于使垦牧公司建成。不仅如此,从1901年到1907年,张謇还先后创立了盐业公司、广生油厂、大兴面厂、轮船公司、房地产公司等19个企业,并联合组成通海实业总公司。尽管张謇已昂首进入工商业者的行列,成为著名的实业家,但他终究还是一个不同于一般资本家的儒商,仍然魂系文化教育事业,并没有忘记自己兴办实业以发展教育的初衷,于1903年在通州创办了师范学校,聘请著名学者王国维等人担任教员,接着又兴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这在当时可谓开风气之先。1904年,他还曾参与设立“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统筹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并相继兴办了一批中学和小学。此时的张謇,已在江南乃至全国都赢得了很高的声誉,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名流。

20世纪20年代初,张謇的实业生涯进入鼎盛时期。他不仅扩建了4个大生分厂,还发展到冶铁、供电、金融以及许多轻工行业。与此同时,在教育方面创办了专门技艺学校、职工学校以及幼稚园、教育馆等,另又兴办了以南通地方社会福利为中心内容的各类事业,包括医院、图书馆、博物馆、气象台、公园、残废院、育婴堂、养老院、伶工学社、模范监狱等。经过张謇的努力,南通已逐渐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小城镇,发展成为粗具规模的近代新型城市。

但是,在此之后张謇的实业生涯即开始走下坡路。由于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向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军阀混战又给民族资本企业造成无穷灾难,张謇经营的大生企业集团也和其他许多民族资本企业一样,未能幸免于难。1922年大生一厂和二厂这两个台柱企业即因巨额亏损开始负债。到1925年大生纱厂对外借款高达1000余万两,已无法继续维持,被江浙财团接办,后又落入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手中,并使得整个大生企业集团及张謇经营的一系列事业先后发生产权的转移。张謇的良谟宏愿最终付诸东流,对此他只能无可奈何地感叹:“謇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尤不幸而抱欲为中国伸眉、书生吐气之志愿。”尽管如此，他辛苦一生建成的实业、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实体，却仍然保留下来并成为后来南通地区发展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胡适曾经说过：张謇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造福于一方，影响于全国。这种评价应该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没有张謇这样的其他人，用自己私人的力量在另一个地方办成这么多事业。

1926年，73岁的张謇在南通与世长辞。这位为近代中国实业与教育发展艰辛奋斗一生并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实业家，至死也未满足自己的成就。他本人在晚年曾说：“謇营南通实业、教育二十余年，实业、教育，大端粗具。言乎稳固，言乎完备，言乎立足于千百余县而无惧，则未也未也。”他担心的是事业未竟，自己“年日以长，力日以薄，智能日以绌，未知观成之何日也？”（《南通中等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演说》，《张季子九录·教育录》）“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这是张謇在《释愁》一诗中留下的诗句。显而易见，他的愁并不是个人生死离别的哀痛，而是忧国忧民的悲愁，是为无法实现自己发展实业教育而救国救民这一远大目标所抱的终生遗憾。

张謇并不看重人们对他如何评价，但是所有正直而善良的人们无不敬佩其一生的追求与努力。据张謇之子张孝若回忆：其父出葬时，“素车白马，四方来会葬的，和地方上人，共有万余人，都步行执紼。凡柩车经过的地方，那沿途观望的乡人，有数十万都屏息嗟叹，注视作别，送我父到他的永远长眠之地。”（《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521页）

以经商和创办慈善事业著称的经元善

以 经 商 和 创 办 慈 善 事 业 著 称 的 经 元 善



经元善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商人当中,有一位在晚清不仅以善于经商引起人们注目,更以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和社会改良活动著称的商董,他就是经元善。

经元善,字莲山(亦作莲珊),晚号剡溪聋叟,浙江上虞人。生于1841年,卒于1903年。经元善出身于上层绅商之家,曾相继从事经营商务、义务赈灾、洋务企业、社会改良等活动,经历了从旧式商人到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家;从洋务企业商董到资产阶级改良活动家的历史性转变。

经元善的父亲于1818年赴上海从商,颇善经营,到19世纪40年代已成为拥资数十万的富商,而且长于社交,热心善举。1858年,亦即经元善17岁时,接受父命到上海学习经商,开始接触商场和各界人士。1865年其父去世,经元善以长子的身份继承了父亲留下的仁元钱庄,并承袭了父亲捐得的知府头衔,接任同仁辅元堂董事,从此即在父亲打下的基础上开始创造自己的业绩。

在经营钱庄方面,经元善早已从父亲的言传身教中学到了各种专业知识,加上他自己的勤奋与努力,很快即使仁元钱庄获得显著的扩充和发展,成为上海著名的钱庄之一。他本人在银钱业中的威望与地位也与日俱增,1883年即被推举为上海南市钱业公会董事,数年后又担任了上海北市钱业会馆董事,不仅在银钱界而且在整个上海商界也都称得上是叫得响的人物。

经元善的才华受到洋务派官僚的重视,1880年经郑观应推荐,他接受李鸿章的委任,与郑观应一起担任洋务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会办。经元善抱着振兴实业“收回通国利权”的希望,认真经理局务,改变过去洋务企业名曰招商,实际并非公开招股的弊端,为织布局设计了登报招股的新办法,将预算公诸于众,并声明织布局如因故中辍,则所收股金本息“如数付还”,又将“所招股本户名、银数,及收款存放何庄、每月清单,布告大众”(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前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在国内外36个城镇公开设立股份代收处。经元善此举首开中国近代企业公开招股之先河,既能保证商股本息不受损失,又能使全社会明了招股情况,以防官僚营私舞弊,因而受到广泛欢迎。认股者源源不断,未及一月即“聚本银三十万光景”,很快又增至50万两。但是,经元善采取的新招股方法,却引起织布局中以戴恒、龚寿图为代表的官方势力的忌恨与反对。他们害怕商股力量过大会危及官股利益,对经元善的新举措竭力加以阻挠,经元善也不妥协,遂与官方的矛盾日趋尖锐,于次年辞去了织布局会办一职。